

香港小型教會的發展與社會變遷的關係

—— 以中華聖潔會為研究個案

鄒詠琪

學號 01003100

畢業論文

宗教研究(榮譽)文學士課程

香港浸會大學

二零零四年四月

香港浸會大學

我們一致通過學生鄒詠琪的畢業論文〈香港小型教會的發展與社會變遷的關係 —— 以中華聖潔會為研究個案〉作為結業要求的一部份，並推薦上述學生接受宗教研究(榮譽)文學士課程委員會審核。

研究進程：_____ (GPU: _____)

論文得分：_____ (GPU: _____)

總成績：_____ (GPU: _____)

(簽名)_____

指導老師陳士齊博士

日期：_____

(簽名)_____

校內評審委員曾立存博士

日期：_____

謝辭

本畢業論文，承蒙陳士齊先生悉心指導，得以完成，謹此衷心感謝。

又撰寫論文期間，曾得下列人士 / 機構予以協助，本人併此致謝。

- 一、 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
- 二、 鄒振國先生提供寶貴意見
- 三、 黃杏樞先生提供寶貴意見
- 四、 何敬賢先生提供寶貴意見
- 五、 蔡志森先生提供寶貴意見
- 六、 馮瑞興先生提供寶貴意見

學生：_____ (鄒詠琪)

日期：_____

論文概要

一直以來，宗教的發展與其在社會中的適應能力息息相關，能夠配合社會上經濟、政治、文化、教育、民生各方面的發展，宗教便能與社會和諧的並存，並得以順利的延展下去。在香港回歸中國以前，受到殖民地統治者的影響，基督教得以在香港順利傳播，其影響更是具有社會性的。本文則嘗試以中華聖潔會作為研究對象，透過研究小型教會如何善於配合社會的發展得以生存，探討一些獨立教會在香港的發展情況，及其與社會變遷的關係，從而了解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透過是次研究，筆者希望能對香港小型教會的發展有深入的了解，並藉此加強宗教團體對社會變遷的關注與適應。

目錄

第一章 導言.....	1-2 頁
第二章 中華聖潔會的背景與發展.....	3-7 頁
第三章 理論架構.....	8-13 頁
第四章 教會發展與社會變遷關係之分析.....	14-28 頁
第五章 結論.....	29-31 頁
附錄.....	32-37 頁
附錄一：於 2003 年 8 月 20 日，訪問鄒振國先生的問卷	32 頁
附錄二：於 2003 年 8 月 29 日，訪問馮瑞興先生的問卷	33 頁
附錄三：於 2003 年 9 月 1 日，訪問何敬賢先生的問卷	34 頁
附錄四：於 2003 年 9 月 13 日，訪問黃杏樞先生的問卷	35 頁
附錄五：於 2003 年 9 月 18 日，訪問蔡志森先生的問卷	36 頁
附錄六：中華聖潔會架構圖	37 頁
參考書目.....	38-39 頁

第一章 導言

在香港眾多的宗教派系當中，基督宗教可算是香港社會中較大的教派，信徒人數多達 50 萬，約佔香港總人口的十分之一。而根據統計，香港現在大概有教會一千多間，當中大部分都是屬於一些大宗派教會的，例如中華基督教會、路德會、浸信會、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聖公會等等，而其他的則是一些規模較小的獨立教會。本文將會透過探討一些小型獨立教會怎樣適應社會變遷，利用社會上的資源開拓其生存空間，從而了解香港小型教會的發展與社會變遷的關係。

受到殖民地時代的影響，基督教得以在香港迅速地發展起來，而當中其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尤為密切。在五十年代開始，香港教會已經緊貼著社會的步伐，針對著社會的需要和訴求而提供協助。五十年代，香港教會得到歐美傳道會大力的支持，為源源湧入的大陸難民提供接濟，也為為數不少的大專學生提供獎學金。六十年代，由於香港教會與外國傳道會聯手回應政府要求，努力興辦學校，香港才能於一九七八年開始九年免費教育。而在七十年代，隨著社會的發展，香港教會的服務更是多元化，除了學校的社會工作之外，寄養服務、中途宿舍、老人中心、青少年發展服務、外展服務等，全面貼近社會的需要。¹到八、九十年代，教會在社會福利服務的角色更加清晰，也得到政府的認同和資助，進一步推動社會福利政策和社會運動的發展。²從以上可見，香港教會與社會的發展實在有著

¹ 郭乃弘：《邁向新世紀的香港教會》（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1998 年），頁 138-139。

² 陳慎慶：〈香港基督新教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載於陳慎慶編，《諸神嘉年華——香港宗教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367-368。

密不可分的重要關係。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研究小型教會如何善於配合社會的發展得以生存，當中以中華聖潔會作為研究對象，探討一些獨立教會在香港的發展情況，及其與社會變遷的關係，從而了解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本研究將會從社會學的角度，探討中華聖潔會在八十年代至今的發展過程。在資料搜集方面，除參考已有文獻之外，筆者亦邀請了五位中華聖潔會的領導人士(中聖書院兼靈風中學校監鄒振國先生、中華聖潔會執事黃杏樞先生、前中華聖潔會牧師何敬賢先生、前中華聖潔會執事會主席蔡志森先生和前中聖書院校長馮瑞興先生)進行訪問，以田野研究的方法作為本論文的立論基礎。透過是次研究，筆者希望能對香港小型教會的發展有較深入的了解，並藉此加強宗教團體對社會變遷的關注與適應。

第二章 中華聖潔會的背景與發展

中華聖潔會是一所獨立的基督教小型教會，會友大約有百餘人，於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十五日正式成立，至今共有七十多年的歷史。³中華聖潔會當年由吳仲連牧師，並數位同工李伊雲牧師、李約瑟牧師和梁智美女士創辦，租用深水埗青山道一車房作會址。⁴其後由於聚會地點過於狹窄，在不足半年內遷往深水埗福榮街九十五號地下，繼續開展其福音事工。⁵

教會初創的時候，是循著五旬節的真理起步的，會友藉著同心禱告、努力傳福音和彼此相愛的心得以維繫教會。⁶在教會成立之初，同工們組織了佈道隊，除了到香港、九龍之外，亦有到澳門、中山、石岐和廣州等地作福音工作，會友們借用信徒家庭開設查經班，又有借用舖子開辦佈道會，他們最少一星期一次到澳門、中山、石岐一帶傳福音及查經。在弟兄姊妹出錢出力的支持下，教會在澳門設立了一個福音站。在廣州方面，由於得到弟兄姊妹的介紹和圖強醫院院長的同意，教會能夠在醫院內設立福音站，每星期都有機會向病人和職員傳福音和開設研經班。而在中山方面，教會在中山雍陌三區設立一福音堂，會友雖以務農為主，但傳福音的心志很強，福音工作進展十分迅速，不足幾年已將會址買下。正

³ 黃吳讚頌：〈會史〉，載於《中華聖潔會金禧特刊》（香港：福音證主協會承印部，1984年），頁12。

⁴ 吳仲連：〈自傳自養的中華聖潔會〉，載於《中華聖潔會金禧特刊》（香港：福音證主協會承印部，1984年），頁15。

⁵ 黃吳讚頌：〈會史〉，載於《中華聖潔會金禧特刊》，頁12。

⁶ 羅德麟：〈從五十週年想到五旬節〉，載於《中華聖潔會金禧特刊》（香港：福音證主協會承印部，1984年），頁10-11。

當會友商討擴建之時中日戰爭開始，消息斷絕，音訊全無。⁷

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中日戰爭年間，澳門、石歧、廣州圖強醫院等工作因缺乏人手而被迫停止，只有中山堂得以維持斷斷續續的工作，而深水埗堂除了早禱和主日崇拜外，其他均處於半停止狀態。在戰爭開始之時，教會有如一個小型難民營，會友中有些被搶匪洗劫一空便來教會投宿，一同聚居。因抗日戰爭的影響，中華聖潔會遷至鴨寮街六號三樓。戰後，由於經濟拮据，便租下白楊街二十五號地下一舖子作販賣豉油之用，藉以維持教會之運作，而教會亦因為人數不斷增加，後來正式遷至白楊街聚會。⁸

在一九五零年，中華聖潔會正式向政府申請撥地建堂，一年多之後得政府批准免費將深水埗懷惠路一七零至一七六號給教會建堂，而條件必須建校。經過多次籌款、會友奉獻及貸款之後，教會得到足夠經費作建校之用，並於一九五四年開始動工興建禮拜堂及非牟利私立小學，在一九五七年竣工。小學命名為中聖學校，正式遷堂及招生。當時校監為吳仲連牧師，中聖學校的學生人數逐年增加，在一九五九年時，數達千二。當時學生參加升中試，派位率高，普遍獲街坊好評，福音工作亦見成效，很多學生參加團契、主日學聚會，甚至加入教會成為會友。

9

⁷ 黃吳讚頌：〈會史〉，載於《中華聖潔會金禧特刊》，頁 12。

⁸ 同上，頁 12-13。

⁹ 中華聖潔會網頁：〈本會歷史〉。檢索日期：2004 年 3 月 15 日。取自 World Wide Web:
<http://chclove.hk.st/>

在一九七零年，香港小學生人數漸減，直接影響中聖學校的收生情況，於是校董會便於一九七四年決定向教育司署申請改辦英文中學。經多次商討，終於一九七六年獲批，同年易名為中聖書院。而七十年代可算是中聖書院最艱苦經營的時代，在剛剛由小學轉為中學的時期，被派入中聖書院的學生大多是學業成績較低、操行有問題的學生，學生在校內吸煙飲酒、粗言穢語是屢見不鮮的事情，女生懷孕、男生犯案更是當時學校要面對的重要問題，那時，沒有很多教師願意委身於中聖書院，學校教師流失率極高，平均教師的任期亦不會超過兩年，這個時期是較不明朗的。及後，在一些甚有教育理想的校長、教師的帶領和努力下，¹⁰中聖書院有了明確的目標，本著「拾荒者」的角色，矢志培育社會上被忽略和厭棄的一群。至八十年代，中聖書院已經成功在社區中獲得一定的口碑，學生的學業成績和操行也有著重要的增長。¹¹

在中聖書院順利過渡為中學之後，政府於那時正正大力興建設施更佳的津貼中學，基於校舍的限制，中聖書院未能轉為津校。而由一九七八年九年免費教育實施開始，私校教育進入調整期。在這段期間，私校的數量下降，而私校學生人數同時下跌至整體學生人數之一成。¹²而當年政府對私校的政策是透過買位制度，將水準較低的私校淘汰。所謂的買位制度其實就是政府派學生來，並給予適當買位資助的一項計劃。¹³中聖書院在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經歷了三年的全面

¹⁰ 當時的幾位校長分別是李柏雄先生、劉兆英先生和馮瑞興先生，而李柏雄先生和馮瑞興先生都是中華聖潔會的會友。

¹¹ 資料來自 2003 年 8 月 29 日與馮瑞興先生的訪問。

¹² 譚萬鈞：〈會長的話〉，載於《香港私校聯會 1999 年週年大會刊物》(1999 年)，頁 4-5。

¹³ 鄒振國：〈中聖傳奇〉，載於《中華聖潔會月刊——振翅》(2004 年 3 月號)，頁 9。

評核和審查，終於在百多間私校被淘汰後仍能以優質辦學成績繼續成爲買位中學。¹⁴

一九八五年，中聖書院面對政府縮減買位學校，教會憂慮學校若未能獲繼續買位，不單不能繼續辦學，其基址亦會受影響。教會於是作了三項重要決定，第一是放棄現址，以交換一所津貼中學的主辦權，第二是成立一間分開註冊的教會，以至可獨立處理財政，以備不時之需，第三則是在新市鎮購買堂址。¹⁵

由於財政及地方問題，在新市鎮購買堂址這項計劃不久便已告吹。而教會亦於一九八六年正式註冊多一獨立教會，名爲中聖教會。在另一方面，以現址換取津校辦學權的建議，經多次文書往來後，發覺並不可行，教育署只會考慮申辦津校，於是教會在修改會章後，在一九八七年正式入信申辦津貼中學。

此外，雖然在新市鎮購買堂址這項計劃不成功，但是教會亦有繼續尋求其發展的空間。由於當時政府歡迎社會服務團體參與將軍澳臨時房屋區的社區服務工作，於是教會便去信申請到臨時房屋區作服事，及後於一九八七年成功以象徵性租金到將軍澳臨時房屋區作社區服務。¹⁶一九八八年十月中華聖潔會睦鄰中心正式成立和運作，當時並以中華聖潔會名義主辦，後於一九九零年轉給中聖教會名義承辦，由於兩間教會章則與執事名單完全一樣，房屋署很快便接受了申請。後

¹⁴ 資料來自 2003 年 8 月 29 日與馮瑞興先生的訪問。

¹⁵ 鄒振國：〈中聖傳奇〉，載於《中華聖潔會月刊——振翅》，頁 9。

¹⁶ 資料來自 2003 年 8 月 20 日與鄒振國先生的訪問。

來由於教會希望在將軍澳區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於是便去信房屋署及社會福利署申請租借寶琳村一空置單位作社區服務用途。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白普理基金接納了教會的裝修費申請，資助一百五十萬，翌年中聖教會正式由將軍澳臨時房屋區遷往寶琳村，而中聖教會白普理社區服務中心亦同時運作。¹⁷

一九九七年十月，中聖書院向教育署申請加入直接資助計劃，¹⁸並於翌年九月由買位順利過渡到直資，擺脫了學校與教會多年來前景不明朗的陰影。而在同年，中華聖潔會獲教育署批准在大埔區主辦一津貼中學，經過會友奉獻和四出籌募開辦費之後，於一九九八年九月正式開始辦學，名為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另於其基址設立一堂會，名為中華聖潔會大埔堂，並差遣會友往大埔植堂。¹⁹此外，中聖書院亦於二零零三年成功向政府申請撥款三千零四十萬予學校重建之用，預算重建需時兩年，於二零零五年完成擴建，而學校與教會現在則借用荔景全完第二小學作臨時校舍和聚會地點。²⁰

¹⁷ 鄒振國：〈跨越十載，恩情永記〉，載於《中聖教會 10 週年紀念主日崇拜秩序表》(1998 年)。

¹⁸ 直接資助計劃是由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於 1988 年發表的第三號報告書中提議的一個項目。直接資助是政府向津貼學校及達到標準的私立學校，提供一筆不超過津貼學位成本的津貼，此津貼是按照學校收取學生人數而定。而私立學校成功轉為直接資助後，便要直接面對市場，在收生不足時，所獲取的資助金額便會相對減少，可見這是一個政府進一步淘汰私校的方法。

¹⁹ 鄒振國：〈「直資」路，神帶領〉，載於《中華聖潔會主日崇拜秩序表》(1997 年)。

²⁰ 資料來自 2003 年 8 月 20 日與鄒振國先生的訪問。

第三章 理論架構

宗教團體的發展與社會變遷的關係從來是密不可分，互相處於一相對的地位，而一些宗教上的小教派究竟是怎樣在社會上獲取生存空間，其實也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其意義亦為深遠。筆者亦嘗試就此一課題作深入的探討，而在筆者初步的分析中，各社會學家如馬克思、韋伯、派深思、彼得柏格等的理論似乎未能夠適切地解釋小型教會發展與社會變遷中的微妙關係。而在這一課題中，筆者認為，一個由二十世紀社會學家 Rodney Stark 和 William Sims Bainbridge 共同建構出來的企業家理論(The Entrepreneur Model)對解構宗教團體如何在社會上掙扎求存，以致能夠成功地順利發展有著獨到的見解，而其分析也頗能夠解釋小型教會發展與社會變遷中的關係，所以，筆者則嘗試採用 Rodney Stark 和 William Sims Bainbridge 的企業家理論作為分析香港小型教會發展與社會變遷關係的框架。

Stark 和 Bainbridge 的企業家理論的產生，主要是源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社會交換理論是在古典政治經濟學、人類學、和行為心理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是一個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行為看成是一種計算得失的理性行為的社會學理論，它認為人類的一切互動行為都是為了追求最大利益的滿足。George Homans 是七十年代美國的著名社會學者，他也被公認為社會交換理論的創始者，他在行為心理學理論的基礎上，運用了嚴格的

演繹法建立其基本的理論命題。他指出人們會重覆那種受到回報的行為，相反，那些受到懲罰的則不會重覆。George Homans 的社會交換理論是以心理因素來探討人類的社會行為，他且認為其理論可推廣至各社會制度的層面當中。²¹

及後，Peter Blau 亦以經濟學原理為基礎，將 George Homans 的分析加以擴大和延伸。Peter Blau 對人們如何決定行為的分析是以人們的期望為基點的，人們總是對於從一項活動或從某一個人那裡獲利的潛在可能作出估計，再與其他活動或其他人作一比較，挑選出可望給予最大利益的活動或人。Peter Blau 和 George Homans 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兩者的分別主要在於 Peter Blau 認識到發生特性對社會交換的重要性。他認為社會交換受到人際關係的影響，人際關係又隨同社會交換而發展，同時，社會環境也會影響到其交換。個人地位、社會準則、權力差異及交換關係的相互關聯性等社會環境都能對社會交換產生影響。²²

Rodney Stark 和 William Sims Bainbridge 則是從傳統的交換理論出發，發展出其企業家理論(The Entrepreneur Model)。企業家理論主要是以企業的發展角度，及其企業的經濟模式作為分析新興宗教發展的理論基礎。Stark 和 Bainbridge 的企業家理論雖然是以新興宗教(亦即為小教派 cults)作為其分析對象，但筆者發現其理論亦適用於一些傳統的宗教發展，故此，筆者則嘗試以 Stark 和 Bainbridge 的企業家理論去透視中華聖潔會的發展情況，並以此分析其與社會變遷的關係，

²¹ 劉趙平：〈社會交換理論在旅遊社會文化影響研究中的應用〉，載於《旅遊科學》1998年04期，頁31。

²² 同上。

從而豐富其理論的解釋力。

現在，筆者則先介紹 Stark 和 Bainbridge 的企業家理論的主要論述，而其理論可大致分為以下十個要點：

(1) 小教派(Cults)是一種商業活動，這種商業活動是為他們的顧客提供所需要的產品(Product)從而獲取報酬(Payment)；²³

(2) 那些小教派主要是經營售賣、提供一些新穎的或經重新包裝而看似一種新的補償項(Compensators)給他們的顧客；²⁴

(3) 因此，需要刻意製造以供應新穎的補償項；

(4) 而製造及推銷那些補償項的人，可算是小教派中的企業家；

(5) 這些小教派企業家，一如在其他商業活動中的企業家，是以利潤(Profit)作為動因，而贏取利潤的方法，就是以補償項換取回報(Rewards)；²⁵

(6) 讓進入小教派的商業活動是由洞察小教派商業活動能夠獲取利益而帶動，此種印象大概是因小教派企業家早前曾參與一些成功的小教派而獲得；

²³ 作者沒有就產品(Product)和報酬(Payment)一詞作解釋，筆者則嘗試將產品理解為是一種服務，而小教派所想要獲得的不主要是金錢，所以，報酬不主要是金錢方面的回報，可理解為是信徒的參與和信心。

²⁴ 根據作者在前文的描述，補償項是一種對回報(Rewards,見註腳 24)渴望的無形替代品，當人們在堅持努力下還不能夠迅速和容易地獲得所強烈渴望的回報時，他們可能會接受補償項的提供，而補償項的價值則是取決於他們的信心。其原文如下：“When humans cannot quickly and easily obtain strongly desired rewards they persist in their efforts and may often accept explanations that provide only compensators. These are intangible substitutes for the desired reward, the value of which must be taken on faith.”

²⁵ 如前述，作者認為回報是人們為要獲得而帶來代價的任何東西，人們都是設法獲取回報和避免代價的，回報和代價是緊密結合的，回報的失去等於代價，而避免代價也等於回報。其原文如下：“Rewards are anything humans will incur costs to obtain. Humans seek what they perceive to be rewards and avoid what they perceive to be costs. Rewards and costs are complementary: a lost or forgone reward equals a cost, and an avoided cost equals a reward.”

(7) 成功的企業家需要技巧和經驗，而這些技巧和經驗最易於早期受雇於一成功的小教派裡的工作經驗中獲得；

(8) 製造那些適於銷售的新補償項(原文：或成套補償項(Compensator-packages))時，最易是透過結集一些先前已存在的補償項部件(Components)或補償項系統(Compensator-systems)，使之產生新格局(Configurations)，或是透過進一步發展成功的補償項系統而達致；

(9) 因此，小教派是傾向於群聚成世系(Cluster in lineages)的，他們是透過一些個別的小教派企業家而結連起來的，這些小教派企業家先在一個小教派中開始事業，及後便會離開從而創建另一小教派。由於他們享有很多共同的文化特徵，故此他們亦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家族性相似(Family resemblances)；

(10) 一個以全新面目示人的補償項意念，是可以來自任何文化源頭或個人經驗的，但是那些巧手的小教派企業家在發展那些新穎的宗教產品時，必須會審慎地作嘗試，及致市場有良好反應，才會永久引入那些合適的宗教產品於其小教派中。²⁶

從以上可見，企業家理論集中討論與社會文化環境產生張力的宗教單位，而這些構成張力的主要原因根本上是回報不公平分配所致，那些回報不公平地分配於具支配地位和其他居於次要地位的之上，當中也包括宗教單位和非宗教單位。

Stark 和 **Bainbridge** 的理論有一個基本假設，就是認為人們在一切行爲活動背後

²⁶ Rodney Stark and William Sims Bainbridge, "A Theory of Religion",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87, p. 168-169.

都是爲了尋求回報和避免損失的，這些回報是稀有且分佈於不同的社會系統中，而個人需要透過一些交易或交換去獲取回報。Stark 和 Bainbridge 的理論基本上是建基於一個經濟學上的概念，認爲在個人層面上的代價和回報是可計算及可分析的。²⁷

此外，Stark 和 Bainbridge 認爲一些個人或團體的權力如果能與宗教組織有正面的聯繫便能有助宗教組織獲取可預期的回報，而宗教專門人才也可以應用他們相當的影響力去提高他們的交易、協商能力，那些擁有權力的宗教專門人才其實也需要依靠一些他們本身具有的個人特質，如才智和機敏等，而那些成功的宗教領導人也相對地可以獲得一些無形的回報，如讚譽、權力和滿足感等。²⁸

而且，個人和社會上的地位也標誌著權力不公平地分配於社會上的個體和組織當中，回報往往是有限的供應以致被社會上掌權者或權力機構所壟斷，相對來說，其他的組織便較難得到資源上公平的分配。這裡也標示著個別的人們會獲得比較理想的資源供應，致使他們能夠繼續建立和維持小教派以實現他們成功的社會交易和協商。²⁹

從 Stark 和 Bainbridge 的企業家理論中，可見因著社會上不公平的資源分配，致使社會上很多團體都要不斷透過種種方法去適應社會的變遷，當然，一些宗教

²⁷ Simpson, John H, 'The Stark-Bainbridge theory of Religion', in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Sep90, Vol. 29 Issue 3, p367, 5p., p. 2-3.

²⁸ Rodney Stark and William Sims Bainbridge, "*A Theory of Religion*", p. 169-170.

²⁹ 同上，頁 171。

組織亦不例外，他們也要透過很多的經濟活動和宗教企業人才的計策才能在困難中尋找生存的空間。筆者現則嘗試透過 Stark 和 Bainbridge 的企業家理論分析香港社會的小型教會概況，從而了解他們如何成功地獲取社會資源，繼續順利發展。

第四章 教會發展與社會變遷關係之分析

在要分析香港的小型教會與社會變遷中的相互關係前，我們必先要了解各用來分析社會現象的社會理論也有其局限性，即是無論是那一個偉大的理論架構也不可能把所有社會的面向(Social dimensions)解構和呈現出來，而社會理論應該是具有普遍性的，可以解釋一般的社會現象，並能夠適切地反映出社會的實況。在筆者所採用的 Stark 和 Bainbridge 的企業家理論中，筆者亦發現其理論對應於香港小型教會的現實情況，也有著需要修正的地方，故此，筆者則嘗試從功能主義的角度去修正 Stark 和 Bainbridge 的企業家理論，並以此一修正了的理論去分析香港小型教會的發展與社會變遷的關係。最後，筆者亦會透過對香港政府政策發展的補充分析，以期能更全面評論教會發展與社會變遷之相互關係。

以下，筆者將會從三部分去分析中華聖潔會的發展與社會變遷的關係。

(一) 從功能主義的角度去修正 Stark 和 Bainbridge 的企業家理論

社會學上的功能主義主要是就一事物實際對社會所產生的社會功能(Social function)作出分析，而涂爾幹對宗教的社會功能的分析亦有助人們了解宗教對其社會的功用。筆者則試從涂爾幹的功能主義去補充 Stark 和 Bainbridge 在理論上的不足，並從中作出部分的修正，以切合本論文對香港小型教會的研究。

涂爾幹在研究宗教的社會面向時，比較著重於其社會功能及其對社會整體的

整合性作用，³⁰而在宗教的社會功能此一方面來說，Stark 和 Bainbridge 的企業家理論是較少有在這方面作討論的，其對宗教的關注亦主要是以經濟學上的交易概念來分析的，當中也較少有描述教會在尋求生存空間之時向整體社會所提供的一些社會功能，例如，在解釋小教派尋求發展的動力時，他們主要是關注其推動發展的企業活動原因和背後的利潤目的，而對於小教派在推動發展的過程中所帶來的社會功能則沒有仔細描述。

此外，企業家理論雖然指出了社會上分配不公的事情，但它對社會團體如何透過爭取社會資源從而作出種種社會服務方面則沒有太多詳盡的描述。從以上可見，如要更全面的去探討小型教會發展與社會變遷的關係，以涂爾幹的功能主義去補充 Stark 和 Bainbridge 的企業家理論作分析是比較全面和理想的。

假若從涂爾幹的功能主義作分析，這樣，一個小教派或是任何宗教團體，為宗教顧客製造補償項，他們也需要為社會本身製造「社會性」的補償項(Social compensators)。這些「社會性」的補償項可以看為是一些他們能夠提供社會本身的社會功能或服務，如一些教育服務或社區服務等，這些服務亦能夠提高社會上的整合性，而當他們提供這些社會功能之時，他們也可以因而獲取社會上的資源，如地方和社會上的認同等，從而繼續他們的宗教活動。基於這樣的了解，筆者便可以繼續詳細研究一個宗教團體可以為社會提供怎樣的社會功能或服務。

³⁰ 陳慎慶：〈宗教〉，載於何強星編，《社會學探論——理論與香港本土研究》（香港：學峰文化事業公司，1999年），頁 261-263。

由此觀之，Stark 和 Bainbridge 的企業家理論中的十個理論要點，並不是全部都適用於本研究的，如在理論要點第九項中，提出宗教上的小教派是傾向於世系群聚的，而他們更是會透過一些個別的小教派企業家逐漸結連起來，並且會離開以創建另一小教派。但在本文的探討中，因著沒有世系群聚的特點和企業性的連繫，Stark 和 Bainbridge 的第九項論述似乎並不適用於中華聖潔會的情況，所以，筆者在及後分析之時亦會省去此一論述。

(二) 從已修正了的 Stark 和 Bainbridge 的企業家理論作分析

Stark 和 Bainbridge 的企業家理論基本上是建基於一個經濟學上的概念的，而筆者則嘗試將其理論結合涂爾幹的功能主義作論述之框架。以下，筆者便會就 Stark 和 Bainbridge 的九項理論要點作詳盡的分析，並試圖從小教派和社會上的層面探討中華聖潔會的發展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

在理論要點一中，Stark 和 Bainbridge 指出小教派是一種商業活動，這種商業活動是為他們的顧客提供所需要的宗教產品從而獲取報酬。在中華聖潔會的事例中，我們其實可以發現，教會亦會按著會友的需要而為他們提供宗教產品，致使教會在過程當中獲得一定程度的「報酬」，即是，一種顧客不斷的參與和對團體擁護的報酬。一九八五年，中華聖潔會面對私校發展不明朗之時，教會的領導人士積極籌劃在三年之內購買一個新的堂址，而當中購置堂址的主要原因，其實亦是要為會友提供一個聚會的地方，使會友可以繼續有地方作敬拜，這聚會的地方

亦可以理解為會友所需要的宗教產品。而為到一些經濟上有困難和面臨失業的會友，教會亦有於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三年設立創造就業基金和作慈惠工作，藉此協助一些貧困和遇到生活困難的會友。³¹此外，教會亦嘗試以樂隊、興趣小組和籃球隊去吸引一些年輕人，透過教會同工對他們的關懷使他們留下。³²與此同時，教會亦可以從而獲取一些宗教報酬，這些報酬主要是成員的參與，這可帶來信徒的加入甚至是皈依，也可以為團體提供一些人力物力資源例如金錢的奉獻等。從以上可見，教會的確是為他們的顧客去提供所需要的宗教產品從而獲取報酬。另外，在社會的層面上，教會的顧客也可看作為政府，當政府接納中華聖潔會申請開辦中聖書院和靈風中學之時，教會為政府提供一個發展教育的空間，協助社會在教育部門上的發展，而政府亦相對地向教會提供地方和賦予辦學權，使之可以獲取資源，可見當教會為政府提供所需要的產品時，也能從而獲取報酬。

此外，在理論要點二、三中，Stark 和 Bainbridge 認為那些小教派主要是經營售賣或提供一些新穎的或經重新包裝而看似一種新的補償項給他們的顧客，而這些新穎的補償項也是需要刻意製造的。從上述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見教會會為他們的會眾提供很多類似補償項的事物，如聚會的地方、個人的關懷、一些興趣上的愛好等，以吸引他們的參與。而那些所謂經重新包裝的補償項，我們亦可理解作為一些創造就業基金的成立和慈惠工作的施與，這些都是一些額外給予會友的福利，當中制定計劃的過程亦是經過教會領導人士著意經營的。而在社會層面

³¹ 資料來自 2003 年 8 月 20 日與鄒振國先生的訪問。

³² 資料來自 2003 年 9 月 13 日與黃杏樞先生的訪問。

上看，中華聖潔會在起初開辦中聖學校之時，雖然只是希望能夠給予一班失學兒童就學的機會，但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學校也刻意接收一些操行、成績較差的學生，為社會上被忽略的一群提供就學的機會，而這一方向對於當時其他教會辦名校的典型情況大為不同，也可見到教會亦會為社會提供一些經刻意製造、新穎的補償項事物。

而在理論要點第四項中，則提到企業家職責的問題。Stark 和 Bainbridge 認為小教派中的企業家可算是製造及推銷那些補償項的人。在中華聖潔會，那些教會的領導人士便是在宗教團體中的企業家，在制定政策和向會眾講解、分析當中，他們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一直主導著教會的發展，而他們在會友中間亦正正扮演著調和者和講解者的角色。這些在中華聖潔會的領導人士一直主導著教會重要政策的確立，如決定去籌辦新堂、新校，或為會友提供任何福利等。而他們也負責向會友解釋教會的發展方向和消解他們的疑慮，這亦有助教會的整合和統一。³³在另一方面，中華聖潔會的領導人士在社會的層面上也有製造和向政府推銷他們想要獲得的補償項。如在申請開辦靈風中學之時，教會的領導人士便要撰寫多份的申請文件，並要安排與有關官員接洽等，這些行動對於教會的發展來說也是重要的，也顯示出教會的領導人士在製造及推銷那些補償項當中實扮演著一重要的角色。並且，這重要角色亦表現在教會的領導人士成為他們的宗教顧客和社會顧客的中介者方面，那些教會的領導人士會聚集他們的宗教顧客以成為他

³³ 李慶宏：〈中華聖潔會特別會友大會會議記錄〉(1985年)。

們的利潤從而製造出社會上的補償項，而當他們成功獲得社會上的回報時，便會利用這些回報服務他們的宗教顧客，可見其中介者角色的重要。

在第五項中，顯示那些推動團體發展的動力和動機正正基於企業家對利潤的渴求，而那些企業家更能夠透過補償項換取回報從而贏得利潤。從中華聖潔會的例子來看，這些利潤可分為個人層面和團體層面兩方面。從團體層面來看，宗教團體所能擁有的利潤是會友的參與，但在個人層面，因著會友的參與和投入，也為那些領導人士帶來屬於個人的利潤，如一些來自會友賦予的讚譽、權力和滿足感等。在筆者與幾位教會領導人士的訪問中，他們都不否認作為宗教的領導人士，是可以相對地獲取一些無形的回報，如讚譽、權力和滿足感等，而當中更以權力和滿足感為甚。這些權力主要是管理教會行政、財政、人事方面的權力，和監察學校、社區服務中心運作的權力等。滿足感則來自領導人士成功克服困難的喜悅，如成功申辦大埔堂靈風中學、成功為中聖書院申請直接資助計劃等，這些都是屬於一些無形的回報，而這些無形的回報亦正正成為他們繼續推動團體發展的原動力。³⁴在團體層面上，教會所能獲得的利潤也可看為是會友的參與，而亦正正由於他們不斷的支持參與，教會可以獲取更多人力物力資源作為回報，使教會能夠壯大起來。此外，成功的發展也會相對地提高了中華聖潔會在社會上的名望，這是一種社會上的認同而可看作為社會回報，使中華聖潔會能夠繼續存留於社會當中，可見這些企業上的利潤也是企業家推動團體發展的動力和動機。

³⁴ 資料來自 2003 年 8 月 20 日與鄒振國先生的訪問。

此外，理論要點第六項中亦指出那些推動宗教小教派進入商業模式的動力和動機主要是透過企業家的洞察力，這些洞察力使他們知道這些商業模式能夠獲取利潤，而此種印象大概是因他們早前曾參與一些成功的小教派而獲得。這企業家的洞察力亦可以表現在中華聖潔會領導人士解決中聖書院危機方面。在一九八五年的特別會友大會中，執事會主席陳耀仁先生向會眾報告及解釋執事會對中華聖潔會和中聖書院前途問題的議決和源由，而在是次會友大會中，其中有關執事會對教會和學校前途問題的議決主要有三方面，分別是以中聖書院向政府換取另一間津貼學校的辦校權、購置一新堂址和註冊多一間獨立的教會。以上的三項建議，均成爲此後教會發展的重要導向，而其領導人士對教會發展的洞察力亦是教會能夠成功擴展的重要因素。³⁵

另外，在社會層面上，企業家的洞察力也表現在他們了解到社會上的需要和渴求方面。在中華聖潔會要向外拓展時，當時的主任牧師何敬賢先生在接觸政府官員時，得知因將軍澳寶琳村在起初規劃上的失誤，以致將軍澳區的社會服務分配不全面，當中的社會服務大多是一些針對某一組別人士的，如老人中心、小童群益會和爲智障人士設立的中心等，將軍澳區缺乏一個以家庭爲本位的社區服務中心。於是，教會領導人士在洞察到這樣的社會服務有發展空間，並能夠獲取回報時，便向政府正式申請開辦社區服務中心。³⁶

³⁵ 李慶宏：〈中華聖潔會特別會友大會會議記錄〉（1985年）。

³⁶ 中聖教會當時能夠順利向房屋署租借地方作社區服務之用，也主要是因爲當時何敬賢先生爲西貢區社區事務委員會的委員，能夠順利接觸政府的政務官員及房屋署高級事務經理，從而得知因將軍澳寶琳村在起初規劃上的失誤，以致將軍澳區在完成整個社區服務規劃之後還剩餘兩個約四千呎的空置地，後來經過何敬賢先生與有關官員交涉，中聖教會便能順利以社區服務的租金（約

在第七項中，Stark 和 Bainbridge 認為成功的企業家需要技巧和經驗，而這些技巧和經驗最易於早期受雇於一成功的小教派裡的工作經驗中獲得。中華聖潔會基本上可以算是一間中產階級的教會，教會當中有約三分之一的就業會友是專業人士，包括有中小學教師、大學講師、會計師、化驗師、工程師、醫護人員等，³⁷他們都是社會上較有權力和財富的一群，而他們於教會團體中的參與亦有助其宗教組織獲取可預期的報酬，這些宗教上的專門人才可以應用他們相當的影響力去提高他們的交易、協商能力，從而幫助團體在社會上的發展。雖然，他們大多沒有於早期工作中受雇於一成功的小教派，但是，那些技巧和經驗也可以從其本身的工作中獲得。這裡顯示出那些企業家的技巧未必是從早期小教派裡的工作經驗中獲得，而是來自他們的社會經驗，這也是因為他們所提供的只是一些社會上的補償項而已，可見這亦是一個在 Stark 和 Bainbridge 理論上的遺漏。

在中聖書院申請直資和及後申請擴建工程之時，學校校監鄒振國先生和校長林銘棠先生負責草擬計劃書，並與有關官員磋商，而當中鄒振國先生的政府公務員身份亦有助他了解政府當局的運作，從而提高他們的協商能力，幫助團體的發展。另外，身為會計師的周文偉先生曾協助靈風中學建立一套會計守則、工程公司董事黃杏樞先生亦協助監督中聖教會的裝修工程、而大學教授高永雄先生也有負責為教會和學校與政府作文書上的往來。³⁸由以上可見，那些宗教上的企業家

為市值的百分之五十)向房屋署租借寶琳村寶寧樓地下一二三室及二樓二二二至二二六室。

³⁷ 資料來自 2003 年 9 月 1 日與何敬賢先生的訪問。

³⁸ 資料來自 2003 年 8 月 20 日與鄒振國先生的訪問。

可以應用他們的技巧能力去協助團體在社會上的發展，而他們這些能力亦可以從他們本身工作的經驗中獲得。

而在理論要點八中，指出當企業家製造那些適於銷售的新補償項之時，主要是透過結集一些先前已存在的補償項部件或系統，使之產生新格局示人，並且，也有一些是透過進一步發展成功的補償項系統去編造一些較適合銷售的補償項。在中華聖潔會的崇拜形式發展當中，我們也可以了解到其間的轉變。以往，在教會主日崇拜中，主要是用上一些比較傳統的長詩歌，並多以鋼琴伴奏，崇拜形式比較保守；而現在，教會的崇拜模式已漸趨開放，雖然崇拜仍會以鋼琴伴奏為主，但教會間中也會用上樂隊作配樂，並加入一些流行原素，氣氛比較輕鬆，其主要目的亦是為了配合社會變化，也為了迎合青少年的口味。³⁹由以上可見，在一些已有的補償項原則之中，加上一些新的原素，便能夠更加配合會眾的需要和他們的社會文化背景。在另一方面，教會在開辦私立中學中聖書院方面，也是由起初辦小學慢慢發展為辦中學的，當中學校的發展方針更是配合到社會的需要，專門接受一些操行、成績較差的學生，可見這亦是一個透過進一步發展成功的補償項系統去製造一些較適合銷售的補償項的一個過程。

最後，Stark 和 Bainbridge 認為一個圓滿的以新面目示人的補償項意念，是可以來自任何文化資源或個人經驗，但是那些巧手的小教派企業家在發展那些新穎

³⁹ 資料來自 2003 年 9 月 13 日與黃杏樞先生的訪問。

的宗教產品時，必須會審慎地作嘗試，待市場有良好反應才永久的引入那些合適的宗教產品於其小教派中。在中華聖潔會的發展當中，其領導人士其實亦是不斷的作多方面的嘗試，如嘗試申請開辦小學、中學、社區服務中心等，每項計劃也是經過精心的部署和策劃的，而當中對社會需求的適應力亦是十分重要，否則，這一切的發展便會被社會所淘汰，可見審慎的作嘗試和對社會需求的適應力，對於小教派的發展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

以上都是筆者透過已整合了的 Stark 和 Bainbridge 的企業家理論去分析小型教會在香港的發展情況，可見，那些小教派在發展的過程中，必先要了解自己教會內部的情況，透過一些教會中的企業家和宗教專門人才去制定一些發展的方向，並以其洞察力和才能協助教會的發展，教會才能夠順利的發展過來。而能夠成功配合會眾的需要和回應社會的變遷，更是一個成功小教派的重要因素。

(三) 從香港政府政策發展作分析

從那個已修正了的 Stark 和 Bainbridge 的企業家理論來看，宗教團體的發展除了是爲了配合會眾的需要之外，其怎樣回應社會需要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而在宗教團體的發展過程中，其發展的方向爲何，絕大部分取決於香港政府的政策發展。以下，筆者將會嘗試分析香港政府的政策發展怎樣影響著香港教會的發展，並透過其之間的相互關係了解政府政策在教會變遷中的角色。

香港政府對於宗教的態度一直以來都是開放的，而受到殖民地時代的影響，

基督教亦得以在香港迅速地發展起來，當中教會與社會發展的關係更是十分密切。中華聖潔會作為一間小型教會，在人力物力資源缺乏底下能夠發展至今擁有兩間學校和一間社區服務中心，其實也主要是其成功配合政府政策和回應社會需要所造成。而在政府各項政策當中，對中華聖潔會影響最為深遠的則可算是其教育發展政策，這亦直接影響著日後教會的發展方向，所以，筆者在本部分將會主要討論中華聖潔會怎樣回應政府在教育發展方面的政策。

在政府的教育政策發展方面，五十年代後期至六十年代初期，香港政府致力發展公立小學，以回應適齡學童的增長率。一九六一年，小學生已由五十年代的數十萬人增加至四十四萬多人，故六十年代開始，津貼中小學逐漸增多。到了七十年代，由於普及教育和大規模擴展中學，津貼學校數量大增，⁴⁰而當局也大幅度增加資助學位，並先後於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完成小學及初中三年免費教育的改革。自七十年代政府擴展中學以來，較大的教會辦學的數目不斷增加，後亦加入了許多小型教會和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團體參與辦學，使政府與團體漸漸成為一種合作伙伴的關係。⁴¹此外，一九八一年開始，政府亦逐年擴大高中資助學位，在之後幾年內，興建七十九家中小學，逐步取代向私校購買學位的政策。由於七十年代政府實行普及教育和免費教育等政策，於是其對私校的政策亦有所改變，即對私校採取逐步淘汰的政策。至一九八一年，官立及津貼學校已增至 881 所，

⁴⁰ 津貼學校是由政府資助但由團體管理的學校，學校的一切支出都由政府承擔，後改稱為資助學校。

⁴¹ 程介明：〈精誠所致金石為開——論教會辦學〉，載於《政治變動中的香港教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 54。

⁴²而私校僅剩 322 所，只佔總數的 27%，這與五十年代後期有 828 所私校和 391 所官、津學校的情況形成強烈的對比。⁴³自八十年代開始，政府的教育政策也明顯地由數量上的增長到質素上的關注，也就陸續開展若干大型的改革措施。就中小學有關的重要措施而言，便已牽涉到學制、學額、課程和教學法、評核、學校組織和行政管理、財政和資助模式、教學語言、教育目標、師資培訓和資訊科技教學等各方面。而近年的教育改革則偏重於經濟考慮，並多關注開支、成本、素質方面的情況，發展方向也與之前不同。⁴⁴

爲了配合政府的政策發展，中華聖潔會一直迎合政府的要求，並從中參與協辦一些社會服務。在一九五零年，中華聖潔會由於會眾漸多，便決定向政府申請一個會址，作建堂之用，而一年之後政府則批准免費撥地予教會，而唯一的條件是必須建校。此一必須建校的政策亦是配合當時適齡小學生大幅增長的問題，而在這樣的背景下，中華聖潔會便開始其辦校的事工，可見當時教會主要是基於現實的需要想要申辦堂會，而中聖學校能夠成功建立其實也是政府政策使然。

一九七零年，香港小學生人數漸減，也直接影響中聖學校的收生情況，於是校董會便於一九七四年決定向教育司署申請改辦英文中學，經多次商討，終於在一九七六年獲批，同年易名爲中聖書院，而中聖書院也成爲中華聖潔會開辦中學

⁴² 官立學校是由政府資助和管理的，其教職員爲公務員，後改稱爲政府學校。

⁴³ 楊耀忠、黃均瑜、胡少偉、詹華軍、何景安編：《教育新浪潮——教聯會銀禧文集》（香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2001 年），頁 92-93。

⁴⁴ 謝均才：〈「教育質素」何價？香港教育改革的矛盾、弔詭和效果〉，載於《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二十期 2001 年秋季，頁 3-4。

教育之始。從小學轉辦中學的過程，也可以看到這是一個社會變遷的必然經歷，而其變化的過程也主要是源於教會是否具適應、轉化能力，以迎合政府政策，以致能夠成功過渡，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在政府於一九七八年實施九年免費教育開始，私校教育則進入了調整期。在這段期間，私校的數量大幅下降，而私校學生人數更同時下跌至整體學生人數之一成。這段時期可謂是中聖書院最艱難和最關鍵的時期，而當中政府對私校的淘汰制度也迫令學校要加強其辦學素質。面對著私校的困局，教會也明白到需要一個堂址的迫切性，於是便在一九八五年作出了三個歷史性的議決，第一是放棄現址，以交換一所津貼中學的主辦權、第二是成立一間分開註冊的教會和第三在新市鎮購買堂址。由於當時政府沒有以現址交換學校主辦權的政策，所以第一項建議並不可行。而在了解當時的教育政策後，教會則轉向考慮以中華聖潔會的名義申辦一所津貼學校。

教會在一九八七年正式去信申辦津貼學校之後，教會有關負責人從教育署官員中得知，由於當年中學學額已經飽和，而新校大多會交給有規模的團體主辦，教育署的覆函也寫明「申辦成功的機會是很微小的」，可以想像教會能夠成功申辦津校的機會似乎是很低的。⁴⁵但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政府突然通知中華聖潔會成功獲得大埔一所津校的主辦權，而其實當中教會能夠成功申辦學校亦是與政府的教育政策轉變有關。在一九九七年發表的《第七號報告書：優質學校教育》

⁴⁵ 鄒振國：〈中聖傳奇〉，載於《中華聖潔會月刊——振翅》，頁 9-10。

中指出，多元化的教育體制是優質教育的一部分。⁴⁶政府鼓勵多元化辦學也會增加小型教會成功爭取辦學權的機會，以致政策上傾向批給小團體，避免大財團壟斷辦學權。由以上可見，政府其實於教育政策上的發展一直處於主導的角色，其政策更一直主導著中華聖潔會的發展方向。

此外，在中聖書院申請加入直接資助計劃和擴建工程時也是配合到政府政策上的發展。在一九九七年十月，行政長官的首任施政報告中強調教育為長遠的投資，並重新重視私校及提出政策檢討。一九九八年，政府對直資學校作出肯定，認為直資學校是辦學多元化重要的一步，在這政策的改變中，直資學校也受到重視。在新的政策中，直資金額得以提高，以往容許直資學校貸款改善校舍設施的措施也改為以現金津貼，另亦撥了五億多元作為直資學校改善設施的用途。⁴⁷以上的政策實在為中聖書院將來的發展提供了明確的指引，也使學校在成功加入直資之後的發展更加順利。一九九八年，中聖書院成功加入直資，而在翌年七月政府落實改善直資學校校舍政策，並向現有的直資學校發出通告邀請他們申請撥款改善校舍，中聖書院亦在七月底提出申請擴建校舍的計劃，以回應政府的邀請。擴建工程於二零零三年獲批，而新的校舍預計可於二零零五年啓用，屆時，學校的設施將會達致最新的標準，這也有利學校長遠的發展。

⁴⁶ 謝均才：〈「教育質素」何價？香港教育改革的矛盾、弔詭和效果〉，載於《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二十期 2001 年秋季》，頁 7-8。

⁴⁷ 鄒振國：〈中聖傳奇〉，載於《中華聖潔會月刊——振翅》，頁 10。

綜觀以上的分析，可見政府於小型教會的發展中實扮演著主導的角色，其政策的轉變亦對教會的發展方向帶來重大的影響。香港政府於社會的福利服務中很大程度上倚賴團體的協助，當中更以基督教團體為甚，而教會對社區服務的參與也是政府間接促成的，當教會越來越進入政府的伙伴模式中，其對社會的參與性亦會增加。在另一方面，教會亦會基於現實的需要去為政府的要求、社會的需要作出配合。由於中華聖潔會是一個缺乏財政資源的教會，在很大程度上，教會要倚靠政府才能夠生存過來，於是教會與政府的關係便十分緊密，政府政策亦主導著教會的變遷。

第五章 結論

中華聖潔會是一所香港的獨立小型教會，於二零年代創立，至今共七十多年的歷史。在七十多年的發展中，教會由深水埗的會址，發展至將軍澳和大埔兩處新市鎮地區，而透過教會領導人士與政府不斷的交涉和多項的申請計劃，教會成功過渡八十年代的辦校危機，並且將這些危機轉化為一個又一個的轉機。

從已整合了的 Stark 和 Bainbridge 的企業家理論，筆者了解到那些小型教會在發展的過程中，必先透過內部的整合，和教會企業家和宗教專門人才的技巧經驗和洞察力，方能使小教派順利的發展過來。而能夠成功配合會眾的需要和回應社會的變遷，更是一個成功小教派的重要因素。此外，對於一些缺乏財政資源的獨立教會，它要成功的發展過來，則必須要與政府建立一種密切的關係，並透過回應政府、社會的需求去尋找其生存空間。

在中華聖潔會的發展過程中，筆者發現其對社會的回應傾向被動，未能較主動地回應社會的需要，而在其向外拓展的過程中，其主要目的亦是為了保存其生存空間，這一點實可表現在教會在獲知得到大埔新校辦校權時的內部爭論上面。在教會獲知得到新校辦校權的時候，教會內部對於是否接受這所學校和會否在新校開辦教會曾發生激烈的爭辯，這樣的爭辯也是由於他們向政府申請新校時的原意只是想將中華聖潔會搬遷到那裡，不是為了開展新事工，而當中聖書院的辦校

危機過後，教會亦沒有必要搬到那裡，所以，教會內部曾為此作出辯論。⁴⁸由此可見，中華聖潔會對外開展的用心實在不強，其回應過程主要都是被動的，發展的動力主要是來自其生存危機，而當危機過後，其發展的動力也大大轉弱，這也顯示出其典型中產教會的保守性和求安定性。⁴⁹

此外，中華聖潔會基本上沒有一套完整的神學思想去支持其對社會的關懷，而正正由於教會的內部信仰缺乏了這樣的意識形態，其發展也趨於保守和被動，這其實亦是一些小教派在社會變遷下必須要處理的問題，否則，教會的宗教性終會被社會的洪流沖走掉，最後教會亦只會是淪為會友的俱樂部。⁵⁰

最後，筆者認為，中華聖潔會並不是沒有一些主動回應社會的元素的，如在中聖書院早期的發展中，李柏雄先生在帶領學校的發展上，是主動的去回應社區和社會上的需要的，以致吸納一班在社會上被忽略的一群，這個例子明顯地是表現出其主動性的。可是，由於中華聖潔會一直以來過份倚賴一些有才能的領袖，致使教會長期缺乏清晰、一致的使命感，這也大大減低了其回應社會的主動性。

總括而言，中華聖潔會雖然作為一小型教會，但是其發展的潛力還是有很大空間的，倘若教會人士能夠於教會內建構一套完整的神學思想，以作為其社會關懷的根據，這樣相信教會便可以更一致、積極的去回應社會上的需要，以致教會

⁴⁸ 資料來自 2003 年 9 月 1 日與何敬賢先生的訪問。

⁴⁹ 李均熊：〈香港、教會與新中產階級——從階級分析看香港教會之中產化〉，載於《時代的把脈——福音與香港社會的邊緣人》（香港：香港基督教學會，2000 年），頁 32-33。

⁵⁰ 前任中華聖潔會執事會主席蔡志森先生在訪問中也提到中華聖潔會會友十分重情，以致為友誼回教會過於其使命感，他更指出很多會友把教會視為一俱樂部。

能夠在整個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作出主動的回應。

附錄

附錄一：於 2003 年 8 月 20 日，訪問鄒振國先生的問卷。

1. 中聖書院發展情況

- 中聖書院起初辦學目的、有何理念？
- 1956 年辦校至今，學校發展的重點有否不同？
- 學校在社區中的定位是怎樣？有何使命？
- 收生標準較低是因時制宜？
- 學校也可以提高收生標準，往成績看？
- 學校在收生上較看重什麼？是否尚有收生空間？
- 校監任內有何改革？
- 中聖書院有何優勝之處？
- 在申請直接資助計劃和擴建工程時有否遇到什麼困難？

2. 教會與學校關係

- 教會與學校關係怎樣？
- 教職員是否必須為基督徒？為什麼？
- 教育與宗教如何平衡？
- 學校的福音工作如何跟教會銜接？

3. 中華聖潔會發展情況

- 教會近十年有何改變？
- 當中聖書院面臨危機時，教會領導人士積極向外尋覓另一基址的主要原因的什麼？
- 若中聖書院面臨危機，最差情況會否轉型？
- 教會中各專業人士怎樣協助教會的發展？
- 現在教會 / 學校發展較穩定，有否想過會再對外拓展？
- 發展至今最大功勞的三個人？

4. 教會未來展望

- 在可預見的將來，你認為教會 / 學校將面對最艱辛的問題會是什麼？
- 有否想像過中華聖潔會將來於香港能夠有宏大的發展？

——謝謝您接受訪問——

附錄二：於 2003 年 8 月 29 日，訪問馮瑞興先生的問卷。

1. 中聖書院發展情況

- 中聖書院是一所怎樣的中學？有何特色？你對中聖書院又有何感覺？
- 你決定做校長的時候有何考慮？有何使命？
- 在你擔任中聖書院校長期間，中聖書院的發展曾遇到困難嗎？若有，又怎樣解決？
- 在發展方面，中聖書院可以大致分為哪幾個時期？各個時期可有不同的特色？

2. 中聖書院的福音事工

- 在你任內期間，福音事工發展怎樣？
- 中聖書院對於教育與宣教是怎樣平衡的？哪方面比較看重？

3. 教會與學校關係

- 教會為何辦學？中聖書院的宣教使命強烈嗎？
- 教會對學校支持是否足夠？
- 教會與學校的關係是怎樣的？關係是否密切？
- 為何中華聖潔會對教育的熱誠不足？可以怎樣改善？
- 當時教會要考慮是否要靈風中學時，內部的立場是怎樣？

4. 教會與社區關係

- 你覺得中聖書院在社區中地位如何？其在社區中又擔當什麼角色？如何回應社區中的需求？

——謝謝您接受訪問——

附錄三：於 2003 年 9 月 1 日，訪問何敬賢先生的問卷。

1. 中華聖潔會概況

- 你對中華聖潔會的感覺如何？教會有何特色？
- 中華聖潔會有何使命？
- 教會同工與會友概況。
- 教會一直以來人數變動大嗎？為什麼？
- 中華聖潔會在近二十年崇拜方面有何轉變？
- 教會的財政穩健嗎？

2. 中華聖潔會的福音事工

- 教會的教育理念是否清晰？
- 教會的福音工作、宣教工作做得怎樣？
- 教會在學校的學生福音工作發展又怎樣？
- 堂會的福音工作發展又怎樣？

3. 中華聖潔會發展情況

- 在教會發展方面，大致可分為哪幾個時期？各個時期可有不同的特色？
- 中華聖潔會是否一直有計劃的去發展，以致如今能夠發展到兩間分堂？
- 會友參加分堂植堂工作的原因是否因為覺得中華聖潔會的發展停滯不前？
- 教會的危機感強嗎？

4. 教會與社區關係

- 教會與社區關係是否密切？怎樣定位其在社區中的角色？

5. 教會未來展望

- 在可預見的將來，你認為教會 / 學校將面對最艱辛的問題會是什麼？

——謝謝您接受訪問——

附錄四：於 2003 年 9 月 13 日，訪問黃杏樞先生的問卷。

1. 中華聖潔會概況

- 中華聖潔會有何使命？
- 教會有何特色？
- 教會會友概況。

2. 中華聖潔會發展情況

- 在教會的發展中遇到什麼困難？
- 中華聖潔會在近二十年對內方面有何轉變？
- 在教會發展方面，大致可分為哪幾個時期？各個時期可有不同的特色？
- 你怎樣看一些小型教會的發展？

3. 教會與學校關係

- 教會與學校的關係密切嗎？對傳福音有一致的目標嗎？
- 中華聖潔會的福音對象是否主要是中聖書院學生？

4. 教會與社區關係

- 教會與社區關係是否密切？對社區關懷感強烈嗎？

5. 教會未來展望

- 教會現在的發展方向是怎樣？
- 教會近年有做佈道工作嗎？
- 你對教會未來的發展是否樂觀？
- 在可預見的將來，你認為教會將面對最艱辛的問題會是什麼？

——謝謝您接受訪問——

附錄五：於 2003 年 9 月 18 日，訪問蔡志森先生的問卷。

1. 中華聖潔會概況
 - 教會有何特色？
 - 為何教會有這樣的現象？
 - 中華聖潔會有何使命？

2. 中華聖潔會發展情況
 - 在教會成立與發展中遇到什麼困難？怎樣解決？
 - 在教會發展方面，大致可分為哪幾個時期？各個時期可有不同的特色？
 - 中華聖潔會在近二十年對內方面有何轉變？
 - 中華聖潔會在近二十年對外方面又怎樣拓展？
 - 教會發展的趨勢是怎樣？

3. 教會的差傳工作
 - 會友傳福音的心強烈嗎？
 - 教育與差傳的工作比重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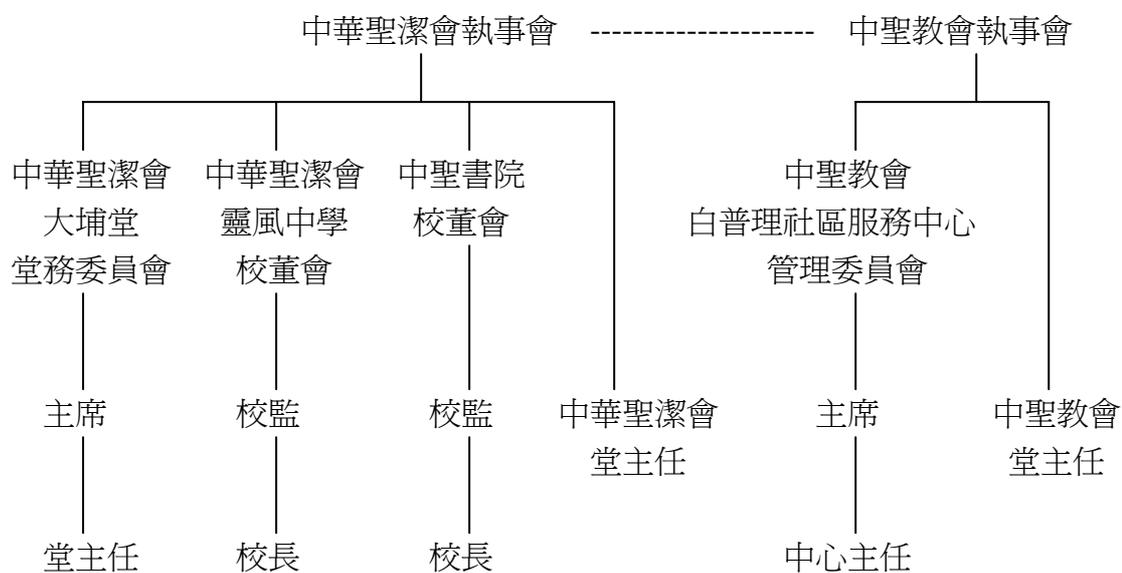
4. 教會與學校關係
 - 教會為何辦學？中聖書院的宣教使命強烈嗎？
 - 學校與教會關係怎樣？

5. 教會與社區關係
 - 教會在社區中地位如何？
 - 教會與社區關係是否密切？如何回應社區中的需求？
 - 為何教會在承接上遇到困難？

6. 教會未來展望
 - 在可預見的將來，你認為教會/學校將面對最艱辛的問題會是什麼？
 - 自己對教會將來的發展有什麼展望？
 - 對教會將來的發展是否樂觀？

——謝謝您接受訪問——

附錄六：中華聖潔會架構圖



參考書目

- 李均熊(2000)。〈香港、教會與新中產階級——從階級分析看香港教會之中產化〉。《時代的把脈——福音與香港社會的邊緣人》。香港：香港基督教學會。
- 郭乃弘(1998)。《邁向新世紀的香港教會》。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
- 陳慎慶(1999)。〈宗教〉。何強星編，《社會學探論——理論與香港本土研究》。頁 256-281。香港：學峰文化事業公司。
- 陳慎慶(2002)。〈香港基督新教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陳慎慶編，《諸神嘉年華——香港宗教研究》。頁 367-368。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程介明(1995)。〈精誠所致金石為開——論教會辦學〉。《政治變動中的香港教育》。頁 53-59。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楊耀忠、黃均瑜、胡少偉、詹華軍、何景安編(2001)。《教育新浪潮——教聯會銀禧文集》。香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 中華聖潔會金禧慶典籌備委員會(1984)。《中華聖潔會金禧特刊》。香港：福音證主協會承印部。
- 中華聖潔會特刊編輯小組(2000)。《中華聖潔會七十週年特刊》。
- 李慶宏(1985)。〈中華聖潔會特別會友大會會議記錄〉。
- 謝均才(2001)。〈「教育質素」何價？香港教育改革的矛盾、弔詭和效果〉。《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二十二期 2001 年秋季》。
- 劉趙平(1998)。〈社會交換理論在旅遊社會文化影響研究中的應用〉。《旅遊科學》。1998 年 4 期。頁 30-33。
- 鄒振國(2004)。〈中聖傳奇〉。《中華聖潔會月刊——振翅》。2004 年 3 月號。頁 9-12。
- 鄒振國(1998)。〈跨越十載，恩情永記〉。《中聖教會 10 週年紀念主日崇拜秩序表》。

鄒振國(1997)。「直資」路，神帶領。《中華聖潔會主日崇拜秩序表》。

譚萬鈞(1999)。「會長的話」。《香港私校聯會 1999 年週年大會刊物》。頁 4-5。

Rodney Stark and William Sims Bainbridge(1987), "A Theory of Religion,"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Simpson, John H, 'The Stark-Bainbridge theory of Religion,'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Sep90, Vol.29 Issue 3, p367, 5p.

中華聖潔會網頁。「本會歷史」。檢索日期：2004 年 3 月 15 日。取自 World Wide Web: <http://chclove.hk.st/>